



大文化背景下的宝应文化

——浅评刘金城先生《宝应文史百题》

□ 查秀文



恩师金城先生新著《宝应文史百题》出版了,这是他继《宝应学派初探》《宝应史话》之后又一部宝应地域文史巨献。

先生是一个极其认真、严谨的学者,他特地在赠书的扉页为我题签。先生的书法亦十分了得,笔法字法精到,线条一波三磔。一如他潜心研究的宝应文史,源脉钩沉,波澜壮阔。

先生孜孜于文史研究,探幽穷赜已经二十载。用先生的话说,这二十年,他满脑子都是宝应文化,为它而苦,为它而乐,几近疯狂。

疯狂是一个学者做学问的执著态度。而令我尤为敬佩的,先生对于宝应文史的宣传和推介,也是疯狂的。他逢人必谈宝应文化,逢会必提宝应文史。他甚至不分场合振臂疾呼:宝应人不能不知道宝应历史。

知先生者,谓之执著,穷理致知;不知先生者,谓之愚执,钻牛角尖。

文化历来争辩纷然,先生坦然研学,沉浸其中,挖掘出了一大批宝应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名士大儒、史学资料,填补了宝应文史研究的一大片空白。

先生的《宝应文史百题》,内容厚重,视野开阔,高屋建瓴。他站在中国古代的大历史观、大文化背景下,将宝应文化作为全国文化的一部分,进行有体系、有逻辑、有章法地解构和总结。他“立足于宝应,放眼于全国,手写百年,心存千古”,他大胆突破,不仅写出了宝应文脉,并将宝应文史理论化,构建了完整、严谨的宝应文化体系。特别是清学三门的理论框架与清学模式的提出,实乃清学研究的一大贡献。

《宝应文史百题》的文体亦别出心裁。既非散文,亦非论文。先生自谓本书写法受《史记》启发,“不拘于史法,不囿于字句,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”。许是受胡适的影响,先生是一个高明的方法论者,全书凡120问,看似零碎,却妙如珍珠,答问之间,独立成篇,行文精粹,叙事蕴藉,理论深致。

以史为脉,循迹溯源。从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石犁,良渚部落的族源,殷商时期的南迁,宋元明清的移民换血、流民定居,到地理风物运化,河湖变迁,言之凿凿有据。

宝应在周为吴地,吴亡属越,越亡属楚,楚为秦并。汉景帝六年史始称平安县,隋开皇初为宜安县,唐肃宗上元三年更名宝应。寥寥数语,建制沿革清晰了然。据先生考证,最早的宝应人应为浙江良渚部落,商周时族源群舒,宋朝数万山东移民进入宝应,及至明清,以苏州人为主。宝应新时期遗址曾出土石刀、石犁、石磨等文物,双掘商周文化遗址出土了陶罐、网墻、角锥鼎、砾石等文物,表明其时宝应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犁耕农业阶段。

宝应古来有水乡泽国之称,最初有九湖五荡,部分湖荡鲜为人知。九湖为:清水湖、汜光湖、洒火湖、津湖、白马湖、广洋湖、射阳湖、博支湖和梁湖。五荡有:黄昏荡、火盆荡、童思荡、蚬墟荡,经历千年沧海桑田,有些湖荡早已废湮。宝应地理环境优越,生态资源独特,刘中柱的《宝应名胜纪略》,记录了宝应四十七处风景名胜。

运河文化在先生的书里占据了一定的篇幅。众所周知,“邗沟肇始于春秋”,

为吴王夫差开凿,通江淮,入广陵,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刘宝楠是第一个研究宝应大运河的学者,也是早期研究中国大运河的奠基人。刘宝楠的《宝应图经》是运河学的奠基之作,重点记载城邑之沿革、河湖之变迁、漕运之通塞,总结了宝应境内邗沟段自始筑至明代万历四十一年有十三次变迁,史称“邗沟十三变”。

但先生的研究总能伸进内里,掸尘揭盖,张力开泰。研究成果更令同研学者瞩目:一是宝应大运河是京杭大运河惟一的具有完整历史的河段。这是宝应大运河珍贵的文化资源,也是建设宝应大运河文化带的重要支撑。二是射阳是邗沟的终点,是古邗沟惟一遗存的古镇,对于京杭大运河有着典型的意义,代表着大运河渊源期文化,是大运河文化的根,射阳城是大运河文化中最早的城市。三是为补县志及刘宝楠《宝应图经》之遗缺,先生自行整理出《宝应大运河历代工程史考》,引经据典,从吴王夫差掘沟引江入手,经东汉、魏晋、隋唐,历南北宋明清,大小修缮工程75次,细至朝代、地点、人物、修建过程,脉络清晰地还原宝应大运河之千年演变历史。

以人为梗,因文生名。从“为袁绍檄豫州”的建安七子陈琳,宝应学派十儒,明清四大望族朱刘乔王,到代表明清文化巅峰的三大集成巨著,四大奠基之作,宝应名儒大儒,人才喷涌,述之娓娓动人。

先生挖掘、整理出的宝应名人蔚为壮观。宝应有56人列“江苏明清文人年表”《清代扬州学记》中所列出的主题人物和附见人物计22名,宝应学者独占9名。宝应的王懋竑在主题人物中居于首位,被看作是扬州学派的先驱。刘永澄、王懋竑、朱泽沄、刘台拱、朱彬、刘宝楠、刘恭冕、成蓉镜、王源、张肱等宝应“十儒”,都是进入梁启超、钱穆《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》的人物。汉代三国第一义士臧洪,是中国儒将典型。康熙状元王式丹,诗文被誉为天下第一。陶澂为诗名极高的淮海诗人。宝应乔氏为淮海文学三大家族之一。宝应有6人列入辞海:臧旻、臧洪、陈琳、王敬则、刘宝楠、高朗亭。臧旻、陈琳、陈矫、陈騤4人写入四大名著之一的《三国演义》。

先生总结宝应文化有八大家:外交家臧旻、文学家陈琳、军事家王敬则、孟子学家刘永澄、书画家陶成、经学家刘宝楠、数学家张肱、表演艺术家高朗亭(中国京剧鼻祖)。宝应学派四巨子:王懋竑、朱泽沄、成孺和刘岳云。宝应有三大集成巨著:王懋竑《朱子年谱》,集朱子研究之大成,代表清代理学最高成就;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,集论语研究之大成,代表清代经学最高成就;刘岳云《格物中法》,集中国科学史研究之大成,代表清代实学最高成就。宝应有四大奠基之作:考古学《汉射阳石门画像汇考》、运河学《宝应图经》、科学史《格物中法》、古地理学《禹贡班义述》。宝应有三大学派:金陵六朝学派、宝应学派、端临学派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先生对宝应学派研究颇深。他凭刘师培“淮海之滨有朱泽沄,于是有宝应学派”一句话立论,在浩瀚的书海中一点一滴收集史料,数易其稿,写成洋洋30万字的《宝应学派初探》一书,发掘研究了王懋竑等一批有历史价值和学

术价值的大儒,大胆提出宝应学派是扬州学派的渊源和主力军,并引经据典加以考证。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诸多知名学者的肯定。

先生研究宝应文化,核心在于研究宝应儒学。事实上,一部宝应文化史,就是一座宝应儒学宝库。而先生论及的每一个儒学大师,都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。先生认为,宝应儒学起始于汉,辉煌于明清,不仅在全国,即使在全国,宝应理学、经学和实学,亦堪称中华之冠。

刘宝楠对宝应儒学有“淮海儒宗,安宜三刘”与“宝应儒学四贤”之说,安宜三刘指刘继善、刘永澄、刘永沁,儒学四贤指刘永澄、乔可聘、朱泽沄和王懋竑。宝应儒学学术化始于刘永澄。宝应儒学名人众多,臧洪、陈容为中国最早儒将;王懋竑、朱泽沄、乔灌、刘台拱、朱彬、刘宝楠、刘恭冕、成孺入儒林传;王懋竑、朱泽沄、刘台拱、成孺为四大儒;按清儒学学术三门理学、经学、实学而论,宝应有清儒三大家:理学家王懋竑、经学家刘宝楠、实学家刘岳云。

理学大家王懋竑,宋明600年理学殿军、扬州学派先驱,梁启超评价王懋竑是“清一代真正研究朱子的惟一的一个人”,他评价王懋竑的《朱子年谱》是“研究朱子的最好的一本书,是国学入门的必读书”。胡适评价《朱子年谱》是“不朽之作”。

刘宝楠是宝应家喻户晓的经学大师,他的《论语正义》是国学必读书,辞海有传。

刘岳云,学术巨子,宝应刘氏之大宗。他的《格物中法》为中国第一部科技史,构建了中国科学知识体系。

据先生考证,宝应古籍著述约900种,入扬州文库61种。其中宝应朱王乔刘四大家族著述颇丰,朱氏270种,刘氏230种,乔氏111种,王氏120种。宝应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、《续四库全书》多达48部,居全国首位。

宝应古代文学与宝应儒学一样“光耀江淮”,文坛泰斗王世贞赞誉宝应为“最文采风流之地”。在先生的研究中,宝应文学始于汉,刘安的《招隐士》是最早反映宝应风貌的楚辞体。汉魏则出现了文学大家、散文宗师陈琳。陈琳首创檄文体,散文多有骈化,《为袁绍檄豫州》等四篇散文均入选中国最早的诗文集《昭明文选》。史上以诗述怀陈琳的大诗人众多,著名的有李白诗:“君草陈琳檄,我书鲁连箭”,杜甫诗:“共传收庾信,不比得陈琳”,李商隐诗:“固慚非贾谊,惟恐后陈琳”,温庭筠诗:“词客有灵应识我,霸才无主独怜君”。唐代,以李白杜甫为首的20位诗人写了31首与宝应有关的诗,将宝应文学推向一个高峰。唐代诗人储光羲曾任宜尉,陆龟蒙隐居宝应甫里寺。及至宋代,范仲淹、陆游、文天祥等有17位著名诗人在宝应留下了21首诗。其中范仲淹的“渺渺指平湖,烟波极望初。纵横皆钓者,何处得嘉鱼”极为有名。

先生认为宝应文学第二高潮蓬勃在明清。刘宝楠《宝应文征》收录宝应诗文六十家,一百余卷。如《安宜六子唱和新编》《敦素园七子诗选》《白天唱和集》《白天风雅前编》《白天风雅》等。宝应诗文集约有700多部。宝应明清文学家代表有:

朱应登、朱曰藩、吴敏道、陶澂、王岩、王式丹、乔莱、刘玉麟、乔亿、刘宝楠、朱克生等。明朱应登、朱曰藩开拓金陵文学有功,朱曰藩创金陵六朝派。王式丹是清代宝应惟一的状元,诗文冠天下。明清宝应诗派林立,诗社众多,宝应诗人单入选《淮海英灵集》就多达78人。本邑文学与外来文学大融合,诗歌繁荣昌盛,王世贞、吴承恩、孔尚任、蒲松龄、林则徐、曾国藩等,都与宝应有过或深或浅的交集和交流。天下至尊的乾隆帝六次南巡,五次诗言宝应。

千年孕古邑,宝地应生辉。先生常说,宝应在文化上取得如此辉煌、显赫的成就,固然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基因,更重要的是,是宝应人孜孜以求、生生不息的人文风骨和坚韧精神。

刘师培赞宝应人品:勤于务本。王世贞赞宝应人才:文采风流。

宝应有三人官至“大司”,曹魏大司徒陈矫,晋大司马陈騤,南齐大司空王敬则。清代宝应又出了一个礼部尚书朱士彦。在贪腐最盛的明清两代,宝应无一贪官。宝应朱氏“为官十五世,清廉四百载”。

先生喟言:宝应人文精神铁骨铮铮,坚忍不拔。汉代的义、明代的气节、清代的理学传统,对全国的儒学文化影响很大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宝应明清文化引领江淮文化三百年。

我读先生的《宝应文史百题》,虽粗精数阅,终有始易后难之感。易的是问答之间,旋能释疑解惑;难的是思考之时,颇难顿悟精髓。先生之解答、论述,其实是在一个极其庞大的历史环境下、文化背景下,抽丝剥茧,条分缕析,断能独立成文,合则前呼后应,无论是时间线、历史线、文脉线,关联线,内里都隐藏着强大的逻辑关系。如果对宝应文史和文化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论,如果不能站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,如果没有对历史本真的足够尊重和文化自信,你会不敢相信,宝应这个弹丸之邑,历史上竟有如此阵容的文人大儒,如此震撼的学术成就,如此磅礴的文化鼎盛。

文化是一场踽踽独行的苦旅。对于曾经灿若星辰的宝应文人是,对于现下沉湎研考的金城先生,亦是。先生研究宝应文史20多年,白手起家,借道高籍,“四海求凰,思之如狂”,常常奋笔疾书,夜不能寐,他将笔触从个体思想转化到具象实体,将时空从远古皓月延伸到头顶苍穹,其研究可以说前无古人。

雪泥鸿爪,抓地有痕。一部《宝应文史百题》,览尽千年文化史。这部书,不仅仅是对宝应历史的总结,文化的提纯,更是通过宝应文人大儒喷涌之现象,学术高博精深之义理,弘扬中国传统儒学文化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先生的研究成果,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
先生今年83岁了。83岁的先生每每谈及宝应文化,依旧声若洪钟,中气十足,激情四溢。我想,单就对宝应文史的贡献,提振宝应人的文化自信而言,先生是有这个底气的。